

文学评论

丛刊

WENXUEPINGLUN
CONGKAN

DZ77/29

当代文学专号

文学评论丛刊

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编

第 28 辑



21075948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·北京

10 : 75948

当代文学专号
文学评论丛刊
第二十八辑
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编

•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太阳宫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5 印张 240 千字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4,800册
统一书号,10190·199 定价:1.90 元

目 录

知青作家群探索	方克强 费振刚 (1)
建国后军事文学发展的两次浪潮	韩瑞亭 (21)
科幻小说的发展趋势和 郑文光的科幻现实主义	魏 威 (36)
论《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》 ——兼论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	禹克坤 (48)
论民俗描写与小说创作	费振钟 王 干 (64)
论超短篇小说艺术	孙 钊 (76)
生命的赞歌 ——评邓刚的小说创作	颜纯钧 (92)

李杭育“葛川江小说”的艺术追求高松年(105)

小镇—螺号—惊涛

——试论陈世旭的小说创作.....周绍馨(119)

论何为的散文创作黄政枢(134)

人间沧桑，笔底波澜

——梅汝恺中、短篇小说创作漫评.....王菊延(149)

读《柳青专集》随记.....王兴平(163)

意象的基本美学特征

——兼论意象在我国当代诗歌中的审美表现...李 黎(179)

新诗的深化和创新赵午生(196)

布谷鸟的呼唤

——读《辛笛诗稿》.....唐湜(221)

沙漠上的绿星

——论杨牧的诗.....汪元波(237)

论新时期文艺中的肯定性喜剧形象陈孝英(253)

历史剧同样要求历史服从艺术

——与郑波光同志商榷.....许 鹏 石伟波(282)

知青作家群探索

方克强 费振刚

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新时期的营养液中得以充分舒展，单篇和单个作家的研究获得巨大的势头，并结出丰硕的成果。然而，任何个体、独特性都不是封闭的自足领域，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植入了社会的和群体的基因，指向和趋赴共性。于是，文学的综合和分类考察日益显示出它的迫切性和宏观价值。复杂纷纭的文学现象只有在归类的整体把握中才会廓清，裸露出规律性的矿脉。——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和内在需求下，知青作家群探索的命题产生了。

—

伴随着生活的伟大转折，一股阔大的作品洪流，冲决长期遭受的思想禁锢，突然奔放倾泻。这时，仿佛经过魔杖一挥，一大群生气灌注、富有才华的知青作家，几乎在同一时刻登场了。一开始他们就令人瞩目。经过时间的汰选和新人的不断加入，八〇年以来，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、较稳定的核心，张抗抗、王安忆、叶辛、梁晓声、孔捷生、张承志、史铁生、韩少功、矫建等等，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用知青作家群来命名他们是贴切的。他们都有一段较长的知

青生涯，都开垦和耕耘过知青题材。他们的作品，汇聚为知青文学主潮。他们异于流派。在艺术风格上，与其说他们是由一些相似的环节连缀的链索，不如说犹如一条不同颜色组成的光谱带。然而，他们毕竟有着共同的履历表，风格光谱带毕竟射映在共同的题材扇面上（反映知青生活和青年题材为主），客体（作品表现的对象）和主体（作家的经历、体验）两方面的相似性势必派生出诸多的共同特征，形成群体的内聚力。他们具有“准流派”的性质。

以知青生活为主体的共同经历，是连结他们的强韧纽带。他们并未一致认识到这一点，至少，尚未自觉地支起这面旗帜。然而在关注他们的读者眼光里，他们却由此成为天然的整体。这是耐人寻味的：他们的年龄与新中国不差上下，他们都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迁徙农村，并几乎都随着运动的告终而溯回城市。他们思想的发育、定型与社会的动乱、复苏不期而合，他们大多数在新时期文学的发轫期应运而生，他们与一代青年以及整个社会有着共同的命运曲线，这使他们内心积淀了强烈的使命感和“我们这一代”的自觉意识。于是，我们不难理解，为什么他们如此执着地表现一代青年的心灵历程，满怀热情地为千百万知青塑像树碑；为什么他们的作品有着相近的思想基调和情绪色彩，形成一浪高一浪的涌潮和大体一致的趋向。

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综合角度来看，新时期的知青文学有过三次大的浪潮。第一次始于七八年前后，其特征是描写心灵“伤痕”，代表作有《伤痕》、《生活的路》、《聚会》等。这是知青抑郁心绪长期发酵和积聚后的一次总喷射，是现实的某种苦涩的还原。有时失于偏颇的否定倾向和过于浓重的悲剧气息，则表明它缺乏并急需推进到更高的视点。知青大退潮后，大致在八〇年，表现“回归”情绪的第二次浪潮涌起了。《本次列车终点》、《南方的岸》、《绿夜》、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等，是先后溅起的几朵精美的“雪浪花”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对前次浪潮的反拨。知青作家们

敏锐地捕捉同代人回城后的情感裂变，开始辩证地反思过去，剥离出美好的事物予以褒扬，作品中浸透着深沉的眷恋和弥漫着思索的氛围。它完成了对一页历史深化认识的使命后，减弱了势头，由塑造“强者”形象为标帜的第三次浪潮所取代。八二年以来，知青文学的题材扇面抖开了更大的幅度，推现出一批具有“强者”性格的丰富形象，如《今夜有暴风雪》中的刘迈克，《世界》中的吴大路，《北方的河》中的“他”，《普通女工》中的何婵。所谓“强者”，是相对于前两次浪潮中的“弱者”、“思索者”形象而言的。他们已经抖落了岁月赋予的忧伤和迷惘，不再沉缅于往昔而是面对现实和未来；他们已经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奋斗目标，思想趋于成熟和稳定；他们的性格烙着知青生活的印记，表现出坚韧、自信和进取精神；他们以强者的姿态对待生活，不停留于思索而更多地诉诸行动。这就是第三次浪潮主人公的共同特征。类似形象在以往的知青文学中并非空白，但成批涌现却是近两年的事。这不仅是现实进程中一代知青性格结晶的投象，也表现出知青作家与新时期文学同步、锐意塑造新人形象的动向。

知青文学主潮正是这样形成的。它充满活力，宏阔而颇有势头地向前奔涌。共同的经历、共同的题材、共同的主题指向，是作家群体的粘合剂。尽管他们遍布在四面八方，尽管没有主帅、旗号和宣言，但互相之间却存在着心心相印的默契。即使他们日益把表现的重点从历史挪移到现实，题材扇面愈加开阔，然而，知青生活作为推远了的背景则永远不会消失，知青情感基因也不会作品中抹去。

二

知青作家们以怎样的眼光审视社会生活的万花筒，并由此得出结论图案，这点是至关重要的。无论他们各自撒开的题材之网

或大或小，但总会有一个辐射中心。每个人的作品篇篇不同，但稍加综览，我们会发现它们大半都串在同一钥匙圈里：人物会有某种类似而构成系列，主题会有某种重复而积累为倾向。这毫不奇怪，每个作家描绘生活评价生活时，总有自己的内在支点和外向视点：他的社会观。社会观会起变化，但有其相对稳定性。

先从王安忆谈起。她的大部分作品有一个中心母题：呼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、谅解和沟通。她从谙熟的“雯雯的情绪天地”走来，重心移入另一个生活圈子，表现何芬式的“庸常之辈”。在后者身上，她从日常琐细的沙粒中，淘出了别人易于疏漏的金子；在貌似“庸俗”的生活追求下，掀露出内在的合理和高尚。这本身是一种深刻的倾心和理解，为雯雯们和何芬们的心灵汇通暗铺了涵洞。此后，“雯雯”与“何芬”便经常在她的作品中相遇、纠葛。

这是两类不同的青年。相异的家庭出身、文化修养、生活圈子、社会职业造就了他们互相区别的特征和追求重心。他们之间存在着不需回避的某种程度的距离、隔阂以至对立情绪。雯雯的浪漫气质、对精神世界的不懈追求与何芬的务实精神、对物质生活的实际操心，是不同的具体生活环境连锁反应的归结，而其端源，则隐匿于各自的家庭。这是历史的遗迹，也不乏现实的因素。社会主义推倒了阶级间的高墙，但阶层的界限犹存。生活中的这种差别和矛盾，构成了王安忆许多作品共同的社会框架。

《墙基》是一篇力作。毗邻的501弄与499弄似乎是两个世界。一边是幽静的花园住宅，住着高知或资本家，另一边是拥挤嘈杂的弄堂，主人都是工人和城市贫民。横亘的高墙拆除后，墙基默默地留存下来。然而正因为此，分处两边的独醒和阿年，在十年动乱中结下的一段少年情谊才显得更加珍贵动人和蓄含深意。

《墙基》的舞台布景几乎未加置换地搬入《流逝》中。那是同一条“墙基”断开的弄堂，同一段历史运转的剪辑，不过，后

者潜心于表现上一代人的沟通。沦落困境的“资本家”少妇欧阳端丽，恰恰从“墙基”的另一边得到了同情、温暖和实际帮助，从金花阿姨、梁阿姨等普通市民的朴实生活观中吸取了精神支柱。

在《归去来兮》中，“墙基”两边的阿桑和真真结合了。耐人寻味的是，他们宁愿从真真家宽敞的洋房搬到阿桑家拥塞的小屋。《窗前搭起脚手架》则剖露了走向沟通中的心理障碍。普通房修工林师傅和有知识的姑娘边微，并不缺乏吸引对方的优点和深入交往的热情，然而，他们都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遮掩起来而急于在形式上追随对方，结果实际距离仍未贴近半步。这也许正应了《墙基》中所预示的：墙基“高出地面一二公分，如要疾跑，又不加小心，便会被绊倒”。

可以说，“墙基”问题是王安忆思考的焦点。她不仅客观而深邃地看到了它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，也敏锐而满怀热情地捕捉住了它的演变趋向。她把铲除“墙基”的希冀置放在青年一代身上。她明了其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。作家的职业特点使她更为关注人的心灵及相互沟通，并力图以自己对“庸常之辈”美好心灵的开掘和经常流露的倾心、理解，给现实的沟通进程施加实际影响。这就是王安忆的社会观，反映了她对社会矛盾及本质的一种艺术认识。

如果说王安忆关注的是历史遗留的“墙基”和青年心灵的沟通，那么，张抗抗则执着地表现新时期特有的现实矛盾，以及由此引起的青年思想的分化。

张抗抗的作品往往弥散着较浓的政治氛围，流荡着一组组思考的旋律。当她按切着一代青年的思想脉搏时，她发现健康的主旋律之外，还有某种不协和音。于是，她致力于描画这样一个世界，在这里，青年愈来愈卷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中去了，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品质，裂变为不同层次。主要分野为两种类型：顺应和推动变革潮流、思想解放的；不适应以至阻碍潮流、思想僵

化的。

《夏》推出了这两种青年形象：岑朗和吕宏。她们都是农场知青，高考制度改革后第一届大学生，但思想观点、生活态度却尖锐地对峙着。岑朗大胆、直率、自信，喜欢“标新立异”。她对社会主要矛盾、男女交往、生活色彩的见解和追求，具有冲决“左”的罗网的意义。吕宏的思想性格是十年阶级斗争的模子压制的，显得刻板而缺乏人情味。她习惯于在“左”的惯性轨道和报上的宣传口径内思索，仅仅在挑剔和整人方面才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。她虽令人讨厌，却还是应予谅解，包括她在爱情上藏头露尾的一点私心。这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涌之前。

在《淡淡的晨雾》里，社会已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动。冤假错案的平反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，冲击并检验着青年的思想。校团委副书记立枢和弟弟立楠又构成同样的冲突。立楠是又一个岑朗，立枢则比吕宏走得更远。他的现实表现不仅是思想僵化，而且泄露了个人品质上的自私和虚伪。他的一切活动和思虑都环绕着一根轴心：个人前程。政治斗争在他眼里不过是提供了升官的良机，认不认“右派”生父，要预测给他带来的是政治正数还是负数。一位他曾追逐过的高干女儿骂他“野心家”，倒是一针见血的。我们不必为生活分化出这种怪胎而惊诧，相反，无视青年思想的分化和对立，倒有社会进化论之嫌。

这种对立带进了变革。《红罌粟》塑造了较为丰满的青年改革者纪小明。他真诚、知识面广、思路活跃，比之岑朗、立楠政治上更成熟，在人民土壤上扎根更深。他的对立面“第四种人”祝融，则完全是立枢式的人物，但更老练、更有城府、更无知、更奉迎和依附于某个领导。张抗抗的近作《一千与一》，则把祝融个性的某一特征置于放大镜之下。主管全省青年工作的“她”，为了给省委书记在仅仅一分钟的接见时留下好印象，宁可让五百名代表在北国寒风中等立两小时，活画出这类人内心隐蔽而不光彩的情感天秤：领导对自己的印象高于一切，得罪群众丝毫无损于个人

前途。

岑朗、立楠、纪小明，吕宏、立枢、祝融、“她”，组成张抗抗笔下两个对立的人物系列。他们的冲突，既是新时期社会矛盾折射的结果，又是内中有机的构成部分。这一代青年，历经了剧烈的社会震荡和不安宁的情绪躁动后，世界观渐趋成熟和定型，开始步入中年。分化的现象自然而然出现了。他们不是分化为不同的阶级，而是更深地介入现实斗争而充实不同的政治力量。这一清醒认识成了张抗抗社会观的底色。其意义在于，使人们易于理解现实斗争为何具有延续性和长期性。张抗抗在塑造这两类形象时，很少掩饰自己的情感倾向和贬褒态度。而且，她作品中还往往出现这类形象，他们介于两者之间，经过一番内心的苦闷、徘徊和思考后，终于站到岑朗系列一边，如《夏》里的梁一波，《淡淡的晨雾》里的梅玫，《北极光》里的岑岑。这无疑透视出张抗抗对这类社会矛盾发展趋势的把握，是她社会观的重要内容。

青年的沟通与分化，分而合与合而分，似乎是矛盾的主题。然而，却内蕴着共同的元素，这就是社会观本质上的一致。王安忆与张抗抗各执社会巨大晶体的一面，但揭示给我们看的是同一个内核。

把另两位知青作家——叶辛与梁晓声——结对予以考察，也是饶有意味的。纵观叶辛丰裕的创作，我们会发现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有着相似的命运。尽管历经坎坷磨难，尽管心灵有创伤泪痕，如《蹉跎岁月》里的柯碧舟在“血统论”的威压下背负沉重的十字架，《追回青春》里的待业青年江彦城遭到势利眼的情人抛弃，《基石》里的景传耕甚至被游街关押，等等。但他们最后总有一个圆满光明的结局，不仅事业露出成功的晨曦，而且爱情也绽开甜蜜的微笑。不啻于此，即使在他们处境最困厄尴尬之时，也总会出现热诚相助的好人，遇到真心爱他的姑娘。人物的命运总是和所处的整个社会的命运纠缠在一起的。这种情节和人物命运某种程度的类同倾向，表明暗中支配它们的作者社会观是这样

的：社会总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，即使在阴影的笼罩下，光明依然没有沉默。

假如说，叶辛闭落大幕时总有喜剧式的圆满，总有几声欢笑；那么，梁晓声作品结尾则往往透出悲剧的氛围，闪动着撞撼人心的泪光。他的笔下，一再出现青年英勇悲壮的死亡。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里，李晓燕、王志刚为征服“鬼沼”倒下了；《今夜有暴风雪》中，裴晓芸、刘迈克分别牺牲在岗位上和抢劫犯的匕首下；在《骤洪》，打鱼“小伙子”为救养蜂姑娘被山洪卷走。这类巨大而异乎寻常的不幸，有的直接反映了现实斗争的严酷，更多的则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严峻对峙，折射入特定的社会风貌和人际关系。他们的死亡，恰恰是崇高人生价值的实现和胜利。社会由于造就和拥有这样心灵美好的青年，而显示其光明面的阔大和力量。周围人们从中获取的崇高感净化和升华着自己的心灵，振作精神并坚定信念：李晓燕的战友从此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不会畏惧屈服，刘迈克的三十九位同伴毅然留在北大荒。社会即由此获得推动力，向光明处滚进。这里，可以看清作者通过描写死亡的屏幕映现的内在社会观。他与叶辛貌离而神合，在对社会阴暗面与光明面的辩证把握及发展趋势的理解上，显出一致性。

知青作家们的社会观，宛如条条溪河，携带着各异的沿途风光，归向大海。他们客观地辩证地看待现实社会，以青年为中心网结的社会关系来概括社会，通过对青年的矛盾和命运的思考触摸到社会的本质规律。

三

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求，在青年心目中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。知青作家们与同代人一起思索着，寻求着；与他们笔下的人物一同跋涉着，摸索着。在《北方的河》、《世界》、《南方的岸》气势恢宏的题记或引诗中，我们感受到强烈而深沉的“代感”。他们

力图表现青年人对真理的向往、火一样的热情和不满足现成答案的特征，执着地反映一代人对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探求，同时，他们也把自己独特的答卷熔铸其中。

让我们来看一看张承志作品里的人物。从《黑骏马》、《绿夜》到《大坂》、《北方的河》，这是一个完整系列。在这系列中，人物的思想性格按照一定的轨道在不断运行着。

应该说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有许多相似之处。他们都充满了强烈的追求欲望，时刻在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，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真正位置。他们都是思想、情感十分丰富复杂的人物，都属于高精神层次。严峻的生活都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，锻治了他们坚毅、顽强、奋不顾身的性格，盈溢着令人瞩目的“阳刚之美”。

然而，稍加分析，我们依然可把这些人物分为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。《黑骏马》里的白音宝力格和《绿夜》里的“他”是以“思索者”的形象出现的。当白音宝力格骑着马寻找自己年轻的恋人索米娅时，当“他”回到锡林高勒草原，寻找记忆中的八岁小女孩奥云娜时，不管冠之于什么理由，他们主要还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平衡。

产生这样的危机感并不奇怪。当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当生活的目标显得茫然、无所适从的时候，无法有力地把握现在和将来就必然要追忆过去，白音宝力格和“他”的寻找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。

这种人生探索的最初出发站依然建筑在个人的地基上。他们尚未把个人在生活中的位置同整个社会、历史和人民交融一起。然而，生活又给他们上了一课。在了解索米娅和奥云娜的生活之后，他们发现，他们的悲欢离合同整个社会和历史承受的苦难相比是太渺小了。在宽阔的草原，淳厚的人民面前，他们显得那样的软弱和心胸狭窄。他们曾过多地指责生活，沉浸在生活给予的不幸之中，而没有真正理解“生活”这个字眼的全部丰富的内涵。

对社会和现实的重新认识，使张承志笔下的人物具有了深沉的历史感和负疚感。他们不再简单地撷取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片断，加以无限止地放大；或者孤立地去看社会中存在的某种缺陷，而开始习惯于把它们放在宏阔的背景中，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重新理解。他们感到自己对现实和未来承担着责任，而自己所做的同巨大的责任相比是那样不相称。过多地沉缅在感伤和遐想里将一事无成，愧对祖国和人民。因为这片土地给予他们的太多，而他们付出的却太少了。

于是“奋斗者”的形象在《大坂》和《北方的河》里出现了。他们没有“思索者”身上的那种彷徨和犹豫，有着明确的追求目标和更强烈的奋斗精神。《大坂》里，那巍峨的大坂象征着他追求的事业，不管是对妻子、孩子的牵挂和空气稀薄、高山反应，都不能阻碍他翻越大坂的决心。令人不能忘怀的是小说前半部对一个在泥土里打滚，有着泥土般肤色的孩子的描写。这孩子象征着这片土地和“他”心灵的苏醒。在他流动的意识里，翻越大坂的行动中，不断闪回着孩子的形象，这意味着他追求的事业同这片土地的联系。

在《北方的河》里，“奋斗者”的形象有了新的发展。在《大坂》里显得朦胧的意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。生活的经历告诉“他”，他的位置，他的价值不在于钻研汉语语音学那样的书斋生活，或者是安闲舒适的计划生育办公室。他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强烈的骚动，一种不可抑制的追求感。然而，他又清醒地知道，这种追求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，这就是把自己放入祖国、人民和历史这样一个宏大的范畴中。

他所选择的人文地理与“北方的河”一样，具有鲜明的象征内蕴。在滔滔东去的黄河岸边，在千姿万态的地质地貌面前，他深深地被一种悠远而凝重的历史所震撼，而感到了自己的肤浅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是黄河的儿子，应具有黄河那种深沉、宽厚、勇敢的品性。他所继承和为之奋斗的一切，无不与这条“父亲之

河”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勾联。

然而，在肯定这种形象的积极意义的同时，我们不能过于偏爱。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弱点：这种人物特有的孤独感。产生这种孤独感的最主要原因依然是人生观和历史观。历史地看待社会和人生，无疑是正确的。但是，我们切忌把现实看成历史的重复或简单延续。因为历史是无法改变的，现实却在不断变革之中。在“奋斗者”身上，历史给予的包袱太沉重了，他们把理解自己的希望投放将来而不是现在。隔膜感就这样产生了。它造成了寻求具体生活位置的游移。同时，孤独感或多或少妨碍了他们走进人民中去充当普通成员。他们主观上意识到必须建立与人民的血肉联系，但是，在精神上却还没有完全同人民化为一体。他们只想去理解人民，而没有想到他们的追求和奋斗也应该被人民理解。

虽然，“奋斗者”身上还存在着某些弱点和缺陷，这也是特定的青年层次真实的艺术还原。但是从“思索者”到“奋斗者”，我们仍然看到了青年一代在人生意义和价值探索上的健康发展趋势。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，人生的意义就在不断的追求之中，而个人追求必须同社会、历史、人民交融契合，同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汇通并流。而这，也就是张承志所表现的自己的人生价值观。

孔捷生是另一个注重人生问题探索的知青作家，《南方的岸》和《普通女工》是他这方面的力作。如果说张承志塑造的“思索者”和“奋斗者”基本上属于同一个人物系列，都是内省型的人物，那么孔捷生则写出了较大的人物反差，描写了两种性格类型相异的青年形象。

《南方的岸》里的易杰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都显得极为矛盾的人物。他的身上留着十年动乱和艰苦的垦荒生活带来的伤痕，但又时时追忆那片浸透了自己青春汗水的土地。他随着大批知青返回了城里，但又不满足在一般人看来可以满足的平庸、

琐碎的生活。他和张承志笔下的人物一母同胎，在精神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他有着同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，总是感到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真正位置。对现实城市生活的失望致使他终于选择了返回农村的道路。

易杰对社会和自己的追求都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，但却缺乏在平凡生活中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。他习惯用理想的剪刀解决矛盾的心结。他没有发现周围生活中就有许多真善美的东西。它们绝不比他追求的逊色。易杰这个人物的真正意义不在于“回归”行动而在于“回归”情绪。因为在“回归”情绪里包含着这样的合理成份：对过去和现实生活辩证的再认识；在一代人责任感的基石上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和对理想的追求。而“回归”行动却不免使人感到疑惑，因为它并不是解决现实矛盾的最好药方。

与《南方的岸》殊异，孔捷生在《普通女工》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普通青年女工何婵的形象。这是作者创作中的一个巨大飞跃，其意义不亚于王安忆由雯雯转向“庸常之辈”。在表现青年一代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上，它标志着知青作家开始不仅仅盯住“高层次”的一群：大学生、画家、业余作者、编辑、干部等等，而把眼光投向人数更多、更普通的青年。也许，孔捷生和王安忆的相似还预示着这样的倾向：知青作家日益由“本色演员”过渡到“非本色演员”。

回到何婵。她身上没有易杰那样浓郁的理想色彩，也没有那样多的追求和迷惘。她生活得很充实。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钻工，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和位置。虽然，生活给了她许多磨难，在她心口留下了难以遗忘的疤痕——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，但她勇敢地挑起这副不轻松的担子。她并不孤独，她以自己认真的工作，诚恳的待人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尊敬。同时，她并没有丧失理想，她用踏实的生活态度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。当她钻研书本、担当组长时，我们同样看到一代人的责任感在她身上闪着光亮。